

“人情”与“女性”

晚清文学与明治文学关系研究

李艳丽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人情”与“女性”

晚清文学与明治文学关系研究

李艳丽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文学与明治文学关系研究：“人情”与“女性”/
李艳丽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

ISBN 978-7-5520-2968-0

I. ①晚…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清后期②日本文学—文学研究—明治时代 IV. ①I206.5
②I313.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56951 号

晚清文学与明治文学关系研究——“人情”与“女性”

著 者：李艳丽

责任编辑：霍 覃

封面设计：周清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cn> E-mail:sassp@sass.cn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20.75

字 数：316 千字

版 次：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968-0/I·364

定价：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

1901年,光绪皇帝颁布了新政改革上谕。无独有偶,1868年,日本明治^①天皇颁布了“五条御誓文”。这清楚地表明,两国政府均以一改陋习、寻求外国知识、巩固皇基作为新政的方针。其中提及的“向世界寻求知识”口号,传递着两国向外部世界开放的信号,具有重要的意义。晚清政府实施了思想与制度的新政改革,从传统迈向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一举成为亚洲强国。

在这激荡的维新时期,出现了两个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林纾和假名垣鲁文。

不通外语的林纾(1852—1924),依靠他人的口述,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凭借200余种单行本译著及卓越的文采被称为“介绍近世西方文学的第一人”。他加入过维新的行列,写过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这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事性。另一方面,林纾作为桐城派的大家名噪一时。晚年的他被批评为与新文学相对抗的封建文人、晚清遗老。

假名垣鲁文(1829—1894)活跃于明治初期,正值江户戏作文学与崭新的外来文明交葛缠绕之际。他创作了很多西洋开化物,如《安愚楽鍋》《万国航海 西洋道中膝栗毛》等喜闻乐见的滑稽小说,为跨入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提供了很多西方的知识。鲁文不通外语、未曾留过洋,他的西方知识很多都来源于大教育家福泽谕吉,他将其一本本启蒙书改写成滑稽小说。他甚至还是日本第一个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人。这样的他,本质里却是游戏文艺的江户遗民,最终他告白说:“归根到底,还是难以理解外国文学。”

^① “明治”是日本明治天皇在位时的年号,时期为1868年9月8日—1912年7月30日。

在全然不同的中日文化背景下培育起来的文人,却拥有着相似的文化活动轨迹与矛盾的文人心理,体现出近代初期东亚两国在面对西方文明时发生的冲突与融合。然而,其“文化保守主义”亦有区别:林纾立足中国语言文化的基础,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的优点,用中国的文学尺度去衡量西方文学,较多呈现西方文明的优点。他以文言文翻译“小说”,亦提供了雅俗折中的模式。鲁文以“日本人”为对象,嘲讽文明开化中的日本的乱象,却缺乏对西方文明甄别、批判的意识。他以妇女儿童为读者对象,延续了江户戏作“虚为主、实为客”的本质。

近代以后,中日两国在西方经济、文化、军事的外部压力下,打开国门并通过改革转型成为近代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林纾、鲁文作为帮助社会大众理解西方文化、形成近代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媒介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林纾虽然是一介在野文士,但其桐城诗文在新旧文人之间获得了广泛且较高的评价;“林译小说”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对后来成为新文学家的众多文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鲁文是明治文坛最出色的也是最后一位戏作小说家,对新文学的创新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鲁文创办的《仮名読新聞》《魯文珍報》成为明治初期与政论性大报相抗衡的“小报”,开创了报刊连载小说的模式,培育了后来成为近代文学的“国民”读者群。近代文学写实主义的倡导者及实践者坪内逍遥就是《魯文珍報》的爱读者。鲁文弟子众多,创作丰厚,可以说,讽刺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的雏形就形成于鲁文影响圈。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林纾与鲁文本身的文学活动并没有交集,但在中日文学史上却有所交汇,提供了比较文学的有趣案例。例如,两者都是本国早期译介莎士比亚的作家,对英国文学的引进传播起到了先头作用;鲁文创作的“毒妇物语”《高橋阿伝夜叉譚》是王韬《纪日本女子阿传事》的蓝本;鲁文编辑出版的《現今支那事情》令其身陷版权案之中,体现出对清朝的蔑视情绪;林译小说中只有一部日本作品,正是德富芦花的名著《不如帰》,这部作品在晚清引起了较大反响。

二

对于一个外语专业出身的人来说,随着自我的学术兴趣的不断定型,常

常会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因为这不仅需要母语的能力、中国文学的背景知识,还需要其他语种的助力。

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今天,即便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文化交流也是寻常的事情。而在此一两百年前,国家之间的交流也不是封闭的。每一个国家都会与别国发生文化交流关系,即便像日本在江户锁国的 200 多年中也依旧保留了长崎港口,选择性地吸纳了中国及荷兰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研究的时候常常会不经意地遇到“比较文学”的缘故。

在我求学的经历中,特别要感谢在复旦读研究生的那段时期。有一位周召孝先生开了江户文学的特别讲义,我莫名地对井原西鹤(1642—1693)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大概是我后来在日本留学时直奔“江户时代”而去的最重要的原动力。于是,我在异彩纷呈的江户文学中发现了诸多宝藏,而在这些宝藏之中,我又捡起了为永春水(1790—1843)。

为永春水是江户后期的戏作小说家、人情本小说的元祖。“人情本”是一种小说体裁,在江户后期迎来了繁荣。其以写实性的会话体,以描写庶民社会的恋爱与人情为特征,通常也被称为“泣本”。人情本最成功的作品是《春色梅兎誉美》,在女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对这本书的最初的兴趣,是出于一些文学评论称其因“猥琐”而被取缔,春水为此还受了刑罚。身为女性,天生对“人情”一词有着较强的敏感。“人情本”描绘的是庶民的爱情故事,所以这个“人情”与“爱情”是什么样的关联?春水成功地塑造了江户时代“意气”的女性形象。所谓“意气”,包含了一种对于命运适从的恬淡理念,融合了日本文化特色的审美意识,被誉为东洋文化的精髓。在压抑的封建时代,《春色梅兎誉美》刻画出的勇敢追求爱情、忠贞不渝的女性,无疑成为普通女性所向往的奔放爱情的最佳代言人。

即便在现代,人情本的元祖为永春水也没有获得很高的评价,甚至有可能被认为研究价值低而处于被忽略的地位。然而,春水开创的通俗易懂的会话体及倡导的“人情”理念,对近代文学的成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塑造的勇敢追求爱情的“意气”的女性形象,也对近代文学的女性命题具有深刻的意义。毫无疑问,在小说的主要因素——“人情”与“世态风俗”这两点上,应该对春水及江户末期的人情本给予适当的评价。

明治十八年(1885),坪内逍遥发表《小説神髓》,提出了“小说的首脑在于人情,世态风俗次之”的重要观点。坪内的文学论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其“写实人情论”明显体现出本居宣长(1730—1801)“物哀”^①的风貌。这也表明了外来的“写实”与内在的“人情”相融合。可是,逍遥自己没有真正地去实践“写实”。紧随其后,明治二十年,二叶亭四迷出版了一部《浮雲》,这部作品与逍遥的《小説神髓》共同被视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可惜的是,二叶亭也很早中止了文学创作。于是,近代文学的实践便落到了一帮搞文学的大学生的身上。

明治十八年,尾崎红叶、山田美妙、石桥思案发起了砚友社。这个社团组成之初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宗旨,不过是一帮20岁的大学生的练笔,并且自嘲为“犄角杓兎”的文学。不过,他们还是有一种共同的风格的,那就是辞藻流利,擅写诉说人情的小说,继承了坪内逍遥写实主义人情论中的“人情”。砚友社的成员诸多且各有风范,仅红叶门下就诞生了四大天王:小栗风云、广津柳浪、泉镜花、德田秋声,其所擅长的深刻小说、社会小说、悲惨小说开自然主义文学之先河。领军人物尾崎红叶几乎垄断了整整10年的明治文坛。红叶作品无一不描写女性,而被称为“女性物语”。他的第一部出世之作《二人比丘尼》自称“一字一泪的大著作”,果然,他写的各式各样的女性物语大都是悲剧性的结局,罕见大团圆的欢喜。

红叶(砚友社)小说常常被批评为社会意义不深刻,但其细致地描绘出人情世态,而成为一大流行。本来,砚友社成立之初就有一种对抗江户以来的儒学劝善惩恶及欧化主义的性质,^②也就是日本本民族的文学与外来(中国、西方)的对抗。这与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思潮发生了呼应。

日本文学一般给人柔美平和的感觉。这大约可以追溯至古代的“まこと”(“真”)论,是一种平淡美、朴素美的文学论。到了近世,儒学成为武士统治阶级的官学,宣扬实利主义的儒教人生观,小说中多充斥着劝善惩恶的道德观念。与这种露骨的教化式小说相比,上岛鬼贯^③“まこと”真情论,将人

① “物哀”是本居宣长提出的平安时代的文艺理念、审美意识,“豪邁なる俊傑の心境にも女々しき心の堺がある”。它将表示对象客观的作为“物”,将表示感动主观的作为“哀”,两者协调为一种优美而细腻的情趣理念,其最高成就者为《源氏物語》。

② 本居宣长的“物哀”当初也是对于用儒学阐释《源氏物語》的突破。

③ 上岛鬼贯(1661—1738),江户中期的俳谐家,崇尚无造作的朴素自然之风。

的自然本性与道德性微妙地结合在一起；本居宣长提出的“物哀”说中包含了优美哀婉的审美与阴柔的人性两个方面，这两者其实统一于“真心”，也就是一种“真”。其实，劝善惩恶式小说虽然是出于对儒教主义下的幕府统治的迎合，但它也是符合人性、符合人们情感评判标准的。所以，井原西鹤的“好色物”、为永春水的“人情本”能够成为流行小说。到了明治时期，红叶小小说是公认的“女性小说”，这与他所继承的西鹤风格、爱读江户小说具有很大的关联。所谓“写实”的人情小说，与“真”也是相通的。

三

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论之后，中国近代小说揭开了帷幕。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小说理论及实验作品、政治小说的宣扬，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最直接的就是促发了谴责小说的兴盛。然而，政治救国的受挫、过分注重小说的政治功利性而抹杀文学性毕竟不能违背小说自身的特性，在短暂的低潮之后，以创作《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而闻名的谴责小说家吴趼人竟高举“写情小说”的旗帜，1906年由广智书局印行《恨海》。这距离“小说界革命”论的提出只有短短的4年。写情小说的热潮无疑是对政治功利论的突破，可是，中国的写情小说，被称为“无情的情场”。^①然而，在租界开放的城市里，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政治革命的退潮，都促进了写情小说的“情”的增加，甚至在辛亥革命之后，演变为炽烈的鸳鸯蝴蝶派。可是，此时期的写情小说并非单纯的男女之间的恋爱故事，而是附加了种种“正名”与“道德”。尽管如此，它饱含了作者真挚而深切的情感。写情小说虽然漫溢着“无情”的泪水，却依然执着地追求“有情”。

无独有偶，日本近代小说的出发始于坪内逍遙的《小説神髓》及其理论的完成者二叶亭四迷《小説総論》。出于对江户时代以来的儒学劝善惩恶的批判、对于欧化主义的抵抗而提出的“人情”，由于过分注重写实人的心理，反而缺乏探求社会的意识。逍遙受自身的文学限制和西方理论的影响（主要受18世纪英国的常识主义、应用文学理论），仅仅4年便停止了创作，贯

^①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彻其精神的二叶亭四迷也很快转向俄国文学翻译。事实上,明治二三十年代,文坛完全被另外一种风格所垄断,那就是以尾崎红叶为主将的砚友社。流利的辞藻,奔放的情绪,充满着江户趣味的“人情文学”。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砚友社被斥责为“低俗”的江户戏作,但更有文学家悲叹,在明治末期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之后,日本文学就消失了。^①

砚友社的地位及遭遇与晚清写情小说很相似。我们一向视 1919 年新文化运动为现代文学的开端,而非 1902 年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的理论。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梁氏强调的文学功利性与教化作用是符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的,可是这一理论之后出现的小说繁荣现象,并非在于政治小说,而更在于写情小说。尽管写情小说在 20 世纪初的文坛占据了很大的分量,出现了痴情、艳情、言情、苦情等各种以“情”字为关键词的小说,却依然被称为“晚清小说的末流”,^②评价很低。到了 20 世纪 10 年代,鸳鸯蝴蝶派又将这一风格延续了下去,风靡一时。由于鸳鸯蝴蝶派构成复杂、良莠不齐,其中“写情小说”的积极意义也被否定了。

中日现代文学的最初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在其发展的早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重视“写情”文学现象。在政治小说、谴责小说之类的功利教化主义理论之下;在对抗欧化主义、国粹主义之下,写情小说的兴起反映了民众真正的心理需求与品位。低俗、媚俗的名称并不能作为对其真正的评价。在重新思考写情小说的意义时,也将会发现社会伦理关系、伦理观念的演进。

四

前几年,我在晚清小说及晚清日语小说译介研究上花了不少精力。从日本文学到晚清小说,这个跨度似乎有点大,而缘起则是 2008 年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承蒙复旦大学黄霖先生邀请我参会。当时我正以

① 永井荷风:《新编朝者日記》,载永井荷风《荷風集》,易风社 1909 年版,第 36—37 页。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香港)太平书局 1966 年版,第 169 页。

“近代初期中日文坛的都市知识分子的情况与思想”为题,^①对日本明治前期的报纸杂志(《驥尾団子》《○○珍聞》)及晚清四大小说杂志进行调查。虽然此时我尚未对晚清日语小说译介问题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但就管见,这一块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第一是对整体情况的把握明显不足,所以细化到各专门题材、具体作品、具体作家、翻译者时,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第二是就当时学术界讨论的比较热烈的“政治小说”而言,先行研究尚未辨明该种类的发源及演变,以至于发生了一些概念上观念上的错误,从而影响了对日语小说译介的整体把握。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总括性的讨论——《清末日译小说中的“德”“情”取舍——以政治小说与砚友社小说为中心》,^②在会议上发表时获得了专家的高度评价。这极大地鼓舞了我在晚清日语小说译介研究上的前进,几年后结集成一本比较有价值的专著。^③

有趣的是,这本小书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是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完成的另外一个作品。在通过对近代初期中日文坛的小说杂志及知识人的考察之后,我最终将“日本”全部去掉,专门做了一篇晚清写情小说的博士论文。^④

晚清写情小说在文学史上被评价为“末流”,它在政治气氛浓厚的20世纪初兴起,被研究者称为“异军突起”。然而,写情小说是事实上的流行,更衍生至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而政治小说、谴责小说不过出现了短短几年。写情小说不应该说是“突起”,而是“复兴”,只是带有重大变化的。

外国人一般将中国文学评价为偏重“政治”的文学,简而言之,即“言志载道”的文学。但是,中国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缘情而绮靡”,小说的主流向来都是言情小说。只是到了晚清近代的时候,才突然被外来的政治小说所突破。但是,有意思的是,出于救国醒民、提高小说地位的政治小说(及谴责小说)很快就被写情小说所取代,而其首倡者就是著名的谴责小说家吴趸人,首先刊载写情小说的刊物就是政治小说的引进者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

① 李艳丽:2005—2007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特别研究员之研究课题。

② 后刊载于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14辑。

③ 李艳丽:《晚清日语小说译介研究(1898—19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

④ 李艳丽:《清末写情小说における〈女性〉——近代初期文人の女性をめぐる肖像とその在り方》,博士学位论文,东京大学2013年。

对于这样一个奇妙的文学栏目配置、作家与政治家的配置,该如何解读呢?研究写情小说的意义,不仅是对文学史的修订,更重在探讨中国文人在近代的转型。“写情小说”是特定时期下的文学名词,“主情主义”是在近代化过程中,旧有的秩序开始被质疑而逐渐瓦解、变化之际经常发生的思想运动。写情小说表现出与上层政治不同的下层“女性性”的建立,这是世界史上被指摘的相同点,具有普遍研究的意义。

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转折期,写情小说家虽然依旧维系着(相对于女性的“阴”来说的)男性自我的“阳”,但作为传统文人的“阳”已然凋落。而填埋这一凋落的是以往处于“阴”的位置的女性的“情感”,这一“情感”被试图推升至国家的“理想”。这也就是写情小说的“情”之所以被提升至国家、忠孝大义的“情”的内因。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原本阴柔化、女性化的“文人”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从“阴”的位置上开始蜕变的一个瞬间。即晚清写情小说暗示了在儒教制度下发挥着“阴”“女性”作用的文人,终于将要打破这一历史框架。可是,晚清写情小说家毕竟还是处于“阴”的位置,既重视传统道德,又非政客、精英知识分子。

晚清文人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局限性的最大要因在于,“女性化”毕竟只是“化”,作为作者的男性依旧维持着他身体的权威。另一方面,虽然女性作为丰富的“情感”存在而得到了深刻的描写,但是她们的“情感”往往被男性的“权威”所阻碍。这也是写情小说被评价为“无情的情场”的原因。尽管如此,在儒教体制的瓦解中,女性的“情感”与象征了忠孝节义的“理想”形成互补关系,并且逐渐完备了“情感”自立的条件。晚清写情小说中的“女性”描写,就处于近代中国黎明期“理想”与“情感”的价值观转换之中。

五

女性形象研究在文学史上一直都是别有兴味的课题,不仅有着文学审美、大众审美的需求,也有时代的需求,比如近代初期倡导的“贤妻良母”。不过,在日本文学史上还有一类恶女/毒妇的形象,却也是作家们钟爱的对象。

高桥阿传,生于1850年,卒于1879年,享年29岁,是明治时期乃至日

本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毒妇”。她用剃刀割了富商的喉咙致死而被处以斩首的极刑。自她被处死的第二天起,新闻媒体上便开始刊登她的故事。其后,从明治到大正、昭和,阿传故事的版本层出不穷。在阿传故事的始祖假名垣鲁文的笔下,^①阿传不仅杀了富商,还勒死亲夫,对她的某个情夫毒杀未遂,被勾勒出一个剽悍的狰狞形象。

同样是在明治时代,阿传被处死4个月后,晚清文人王韬游历东京。他在新富座剧场观看了一出《高橋阿伝》的歌舞伎,然后,他写了一篇观后感日记,5年后做了扩写与补充,以《纪日本女子阿传事》为题刊登于晚清著名的画报《点石斋画报》。

然而,在王韬的笔下,妖女阿传的面貌似乎柔和了许多,甚至有美化成“美妇”“贞妇”的嫌疑,研究者认为王韬对阿传给予了同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新富座上演的歌舞伎底本是河竹默阿弥《綴合於伝仮名書》。在江户时代的“恶女”“毒妇”形象的传承中,歌舞伎是一个重要的载体。王韬的写作无疑是改写与“美化”,与日本流传的作品及形象之间发生了偏离,这也影响了今日中国学者的解读。

阿传的真面目究竟如何,作为一个平凡的农村女子,可能无法被大众获得确凿的史料。但是在近代初期的差不多的时段,中日文人对其形象的“毒化”与“美化”书写却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不仅与作家个体的审美、中日文学的审美有关,也与时代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假名垣鲁文这个日本本土作家,大概并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中国作家拿去做了改写,不过他与中国的关联还不仅限于此。

幕末明治初期出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支那遊記》《支那事情》,这些记述描绘了晚清“不卫生”之状况,流露出负面印象,而且这种印象还延续至明治后期、大正时期。卫生绝不仅仅是个人清洁的意思,更寓意了近代卫生行政,具有与中国传统医学“养生”不同的社会性、公共性、能动性,是近代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晚清与明治在同一时期注意到西方兴起的卫生学,考察了西方的卫生系统,引进了卫生书籍。但是,“卫生”在两国的发展与建构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日本之所以关注晚清的卫生,既有明治时代疫病流行

^① 假名垣鲁文:《高橋阿伝夜叉譚》,自由阁1886年版。

之背景,港口城市开埠之后因外国人杂居而产生的疫病控制之需,也有鸦片战争之后日本以中国为反面教材的鄙视情绪。

假名垣鲁文是明治初期最著名的戏作家,他将大儒福泽谕吉的著述改写成诙谐的小说,为跨入新时代的明治人提供了通俗易懂的西方知识。这个没有出过国的作家在明治八年撰写了一部《现今支那事情》,竟引出了一桩版权侵犯案。原来他大量抄录了前一年出版的永峰秀树的《支那事情》,然而,鲁文新加的内容也可能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晚清的“卫生”。

1865年,福泽谕吉《唐人往来》发表,评中国:“众人皆不知世间,自恃本国为至上尊贵之物;更不知学习他国之风以改革,因狂妄自恋之病而酿成灾祸。”^①其后,他在《世界国尽》(1898)中也表达了相同的中国观。^②无独有偶,假名垣鲁文的《现今支那事情》中也有一段相似的话:“支那文物本领先于他邦,教化为世界之前驱。然其开化滞留于半途,妄自尊大而蔑视轻侮其他。背弃盟约,常狡猾,墨守唯我独贵之气象,却数次蒙廉耻,国势渐减。”^③假名垣鲁文被称为“赶潮流的作家”,这个“潮流”便是随着明治的大教育家福泽谕吉“赶”的。

鲁文的代表作《万国航海 西洋道中膝栗毛》(1870)中出现了对中国及中国上海的描绘,将清朝人的发辫叫作“猪尾”(“豚の尻尾”)。江户时代,日本人将蓄辫的满族人称为“芥子坊主”“バッチ坊主”,但并不含有侮辱的意味。到了明治十年后,“清朝=猪”,“蓄辫=猪尾巴”的印象却固定了下来。有研究者对明治初期的媒体做了研究,其中反映的中国印象^④与《支那事情》之类表达的情绪是相符的。猪尾巴是“不洁”的印象,清朝代表了野蛮、顽固、守旧。这个印象不仅仅只是从别人的书中获得的,事实上也出自“内地杂居”的横滨中国街。《现今支那事情》便署名为“横滨 神奈川垣鲁文”。明治六年,鲁文进神奈川县府当差,并搬家至横滨。后来辞去官差,在横滨创办了报纸《假名読新聞》,开设了阅览报纸的茶室。所以,他对清朝人的印象也许是由内而得,亲身经历的。鲁文虽然没有出过国,也不是洋学士,但

① 福泽谕吉:《绪言》,载《福泽全集》卷1,时事新报社1898年版,第19页。

② 福泽谕吉:《世界国尽》,载《福泽全集》卷2,时事新报社1898年版,第4—5页。

③ 假名垣鲁文:《现今支那事情》下册,第38页。

④ 小松裕:《近代日本のレイシズム——民衆の中国(人)観を例に》,《文学部論叢》78,2003年3月,熊本大学。

他以福泽谕吉等人的书为范本,改写出很多有关西方文化的畅销小说,《现今支那事情》也沿袭了他的一贯态度。鲁文是明治初期著名的戏作小说家,作品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可以推测,他的这种中国印象也具有较广泛的接受力。

幕末明治初期,日本对中国的印象具有两面性。一是对传统古典的中国崇拜依旧比较深刻;二是鸦片战争中对战败的清朝产生蔑视侮辱感,这种感觉在描述晚清卫生时便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是明治著名戏作小说家的亚洲/中国认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假名垣鲁文虽然不谙外文,未曾出洋,却以通俗小说的方式介绍了很多西方文化。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日本明治时期最早“翻译”了莎士比亚作品的作家。

作为英国文学经典的莎士比亚作品,在明治前期传入日本时,以青少年为对象的通俗易懂的兰姆版《莎士比亚物语》广为流传。日本以英国为范本建构近代国家,聘请外国人教师、设置英文学科、教授英国文学/莎翁作品,培育了莎学人才;引进诸多兰姆版作品,尝试各种翻案改写及舞台化,报刊媒体发挥了重要的推广作用;兰姆版的译者大多是接受了明治新式教育的英文学者,也活跃于报刊媒体。但是,这并不能严格定义:所谓在大报上刊登就是出于政党政论的目的,在小报上刊登就是出于娱乐性;对译者而言,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娱乐与政治两方面推动了莎士比亚作品的译介与传播,这也从侧面体现了转折期日本文学的特点。

六

从江户人情本元祖为永春水“意气”的女性形象出发的我,当遇到明治、晚清这样巨大的历史裂变期,毫无疑问地被以“传统”去融合、去冲撞“现代”的假名垣鲁文、林纾吸引过去。而在探讨两个看似开化的先进文人的思想历程时,清楚地辨析了其所具有的浓厚的本位文化的情感,“情”“志”之间的纠葛。到了明治中期、清末民初,文人的书写越发聚焦于“道德”与“情感”的相克,男性文人的女性化书写得到了一定的阐释。这条看似蜿蜒的近代初期日文学的比较文学线索,实质潜伏着“情感”与“女性”的暗流。

文字是浪漫的,但有力量。我曾经读到李欧梵先生所写的一段话,很吃惊,忍不住要录下来:“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竟然走火入魔,不知不觉地也步‘五四’先人——特别是徐志摩——的后尘,开始浪漫起来,甚至在自己的第一本中文著作《西潮的彼岸》中大加发挥,把个人感情上的心路历程作为写作的主旨,甚至建立了一种文风,也真是‘情’胆包天,不亚古人。现在看来,连这种自我探索的情操表现也被当今更露骨的‘欲望’描述所取代。我不能说这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只能说当身体取代心灵、商品取代艺术品之后,文学研究变为(批判式的)‘文化研究’也成了一种必然的现象。”^①

这些年来在我的学习中,始终贯穿着“女性”与“情感”两个关键词。近代以后,与上层建筑、表面的政治不同的底层女性的崛起,是近代日本史乃至世界史共通的普遍性存在,这或许就是我的导师黑住真^②先生能够纵容我在“江户明治”与“晚清”之间游走的一个原因吧。

我所就读的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专业位于驹场校区,这是东京大学在帝国大学时期的农学部旧址,研究科下设专业几乎网罗了全世界的文学、思想、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横向贯通、多重文化研究的特质。我一直记得当年科长说的那句话:“地域文化研究专业的每一篇毕业论文都是‘珠玉’。”希望这本小书也能散发出独特的光芒。

李艳丽 戊戌年仲夏于沪上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浪漫一代·中译本自序》,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② 黑住真(1950—),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著名思想史研究者,代表作《複数性の日本思想》《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等。

目 次

自 序	1
-----------	---

第 一 部 分

第一章 跛行的西方文明介绍者

——假名垣鲁文与林纾之比较文学研究	3
绪论：两场维新与两个文人	3
一、转型期的文人意识	5
二、转型期的民众的感觉	18
三、转型期的思想潮流中鲁文与林纾的位置及变化	34
四、小结：介绍西洋文明的“跛行者”	51

第 二 部 分

第二章 令人憧憬的“意气”之姿

——以为永春水《春色梅兕誉美》的女性形象为例	59
一、《梅曆》中的“意气”	61
二、“意气”在江户末期的魅力	70
三、男性书写的“意气”	75
四、小结	79

第三章 近代文人意识中“道德”的理想主义

——尾崎红叶的“女性物语”	83
一、“粹之女”与江户复古	85

二、“侠之女”与明治金本位	90
三、刚强的良妻	95
四、小结	101
第四章 “恶”与“肉感”	
——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再解读	103
引言：近代中国文坛“滞后”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103
一、“丑恶”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105
二、“丑恶”的焦点在于“肉感”？	108
三、日本文学史上的“恶”与“肉体”	113
四、小结	117
第五章 兰姆版《莎士比亚物语》在明治前期的译介与传播	119
一、预出发——幕末明治初期莎士比亚的传入	120
二、兰姆版的各种改写本	121
三、为什么是莎士比亚？为什么是兰姆版？	123
四、戏作与政治共同推动的莎士比亚	126
五、小结	130

第三部分

第六章 “德”“情”之间的浮沉	
——作为写情小说家的林纾的肖像	135
一、“叫旦之鸡”与逸致的“写情”	136
二、林译、自作恋爱小说中的“爱情”与“道德”	144
三、文人的“香艳”趣味与士大夫文学	155
四、小结：林纾性情中的“情”与“侠”	162
第七章 “情”“德”之间的浮沉	
——作为晚清写情小说家的吴趼人的肖像	165
一、游戏小报生涯的“侠骨柔情”	168